

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

马振犊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中国开展了军事情报合作。成立了一所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中方的对苏情报合作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的。因为其性质的特殊性与隐密性,这段历史一直尘封至今。对于中苏双方合作建立的这所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空白。本文根据作者设法搜集到的资料,对其在1938—1939年间的活动初步进行了探索,勾画出了这段历史的一个轮廓,充分肯定了这种合作对中方抗日的价值与意义。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与进行共同研究。

关键词 抗战 中苏 情报合作

—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在国际上,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处于受人同情的地位。但各国的正义和同情只不过是出于道义性的立场,而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则是眼前更现实的考虑。面对强大而霸道的日本与贫弱的中国,为了趋利避祸,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把口惠给了中国,把实惠给了日本。

虽然中国政府对来自国际上制止日本侵略的干涉寄予了极大

的希望,蒋介石亲自出马召见英美德法意各国驻华使节,恳求他们出面“主持公道”,并吹捧美国“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表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可挽危机”。但列强各国为了维持“对交战双方的传统的友谊”,“避免卷入”,一再声明“保持完全的中立”,对中国只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对日本则采实际的妥协退让,甚至于继续与之进行战略物资贸易,间接地支持侵略。种种行为,令中国极其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行抗日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求外援,中国国民政府只好不计前嫌,与曾从友变敌的苏联再次携手,合作抗日。

在列强各国多表冷漠的情况下,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对中国表示了正义的同情与支持,并明确提出可以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

苏联为何要在中国落难之际拔刀相助?原因自然清楚。除了官冕堂皇的国际主义精神而外,乃因日俄有旧隙而欲“拒敌于国门之外”。

苏联与日本原是一对宿敌,当年沙皇俄国为争夺亚洲霸权,与日本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俄国战败,丧失在东北的殖民权利于日本,虽然沙俄已被苏联所替代,但无论是从民族心理或是从实际的国防需要上来看,当时的苏联与过去的沙俄,其处境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俄国人不仅要加倍防范日本的进一步北上,威胁自己的领土安全,而且还想要报历史旧仇。在日本明火执仗杀入中国之际,苏联看出它下一步必将要在

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詹森谈话(1937年7月25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24页。

同上,第359页。

征服中国之后全力对付自己,因此,中苏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唇齿相依兴亡与共的关系。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苏方的对策最好是先发制人,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形成保护自己的屏障。因此,在这种不可避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苏联只好不计一切,公开表明支持中国。但在中方看来,无论如何,在众人皆躲之际,有一勇士挺身而出,也算是真正的朋友。于是,中苏便立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全世界宣示了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紧密关系。苏方还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如到生死关头,苏俄必定出兵,决不坐视。”他们派出了军事顾问与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同时还慷慨地向中国提供财政贷款,表现出了“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仗义。

过去史学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曾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中苏两国在抗日军事、外交及财政方面的合作,但对其在特工情报方面的合作则因资料之缺,无从记述,甚或根本闻所未闻。但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中苏双方当时的抗日合作关系,远比目前我们知道的要密切。特别是在情报合作方面,双方的工作进展迅速卓有成效。后来只不过是因为日本南下野心的迅速暴露与英美的觉醒,中国与西方的合作得以很快建立与加强。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和苏联侧重欧洲西防德国战略的缘故,中苏未能继续在此领域发展关系,国民党政府转而与英美进行情报合作,中苏的这段秘密合作关系也就无疾而终了。但无论如何,抗战时期中苏情报合作的历史是中国抗战史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

由于特工工作的秘密性质,使得有关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保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91页。

密状态,并且不甚详尽,这就给相关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为了揭示出这段历史之谜,笔者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有限的资料去发掘其中的一角,希望达成管中窥豹的效果。

二

1937 年 8 月中苏结盟之后,出于共同对日的战争之需,作为军事合作的组成部分,中苏双方也开始探讨在特种情报领域内的合作。

1938 年 5 月,经中苏双方有关部门协商,达成在对日军事情报领域内的合作意向,并决定成立一个联合情报工作机构。中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方由其国家安全局出面,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军委会派其外事组主任周明与苏方瓦西列夫为各自的代表,签订了《中苏情报合作经费负担议定书》,为这项合作确立了基础。同年 7 月 14 日,由蒋介石签署命令,任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为兼任所长,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及苏方的瓦西列夫为副所长,正式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并迅即在中国各地设立组织,开展了对日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从此,中方对苏合作即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负责。

1938 年 7 月 15 日,中苏“技术研究所”于秘密状态下悄然成立,所址设于汉口市特四区台儿庄路 86 号。在成立之初,内部设立 4 科,各由中方人员主持,苏方人员协助工作。

第一科: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与情报网的布置;科长为军统干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 039(军事)《本会特种情报——民国 27 年度工作报告》。

员江雄风,副科长为科佛多洛夫。

第二科:主办所获情报材料的汇总整理、审核及报告;科长为郑冰如,副科长为友里也夫。

第三科:主管电讯及通讯技术;科长为苏明,副科长为奥斯博夫,后并入第一科。

第四科:负责所内总务、经理及管理;科长为黄昌度。

8月11日,中方改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代替贺耀祖为所长。在这一阶段内,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置在武汉、上海、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宁夏及香港、瓜哇地区的情报网系统。具体安排如下:

1. 天津组:1938年8月6日派出组长倪中立、副组长滕勉组建。工作地区为平津及东四省。其任务是:(1)监视经天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情况,调查其运往内地的军火武器数量与去向。(2)监视日军在伪满洲国的备战情形。(3)对日本在华北地区建立的经济设施进行调查。(4)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进行侦察。(5)对日军的作战计划及兵力部署实行侦查。(6)侦察日军的组成及其装备之变化。(7)侦察日本经天津的入口贸易。(8)建立在平津及东北地区的联络关系。

2. 北平组:1938年8月4日派出组长居仁组建。工作范围为北平、石家庄、晋、察、绥。其任务是:(1)监视日本经北平运往晋察绥之军队及其武器。(2)侦察华北、伪满地区内日本设立的各种经济设施。(3)侦察日本与伪满军队的备战情形。(4)侦察敌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和兵力数量。(5)调查日本建立伪组织的政治阴谋。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 039(军事)《本会特种情报——民国 27 年度工作报告》。

联络办法:有关情报经天津港送交天津组拍发。经费预算每月630元。

3. 山东组:1938年9月27日派出组长李庆霖在济南、副组长王志超在青岛组建。工作地区为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其任务是:(1)侦察敌经青岛之海陆军运输情况。(2)侦察敌在渤海沿岸之海军实力。(3)侦察青岛码头建设状况。(4)监视日本在青岛的出入口贸易。(5)监视敌在津浦、胶济铁路的军运情况。(6)侦察敌对山东之战略计划。

联络办法为在济南设立无线电台一座,负责济、青两地有关情报的拍发。经费预算每月890元。

4. 宁夏组:1938年8月5日派出组长刘英在宁夏组建。工作地区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情报员分布在宁夏、五原、包头、百灵庙、阿拉善旗。其任务是:(1)侦察敌对内蒙之军事布署。(2)侦察敌对内蒙各盟旗的政治阴谋。(3)侦察敌对内蒙、西北的军事进攻计划。(4)调查伪蒙军实力与其组织情况。

为便利联络在银川设立无线电台一座,经费预算每月1025元。

5. 上海组:1938年7月18日派出组长吴润荪组建。派员在沪杭、沪宁两铁路沿线布点。工作地区为上海、京沪、沪杭铁路沿线。其任务是:(1)侦察敌经上海之陆海运输。(2)侦察敌在华中海陆军实力及其布置与作战计划。(3)调查敌经沪向内地的军火武器运输。(4)侦察敌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5)侦察日本驻军的组织、编制及其装备。(6)调查日本经上海的入口贸易情况。(7)建立该地组织与汉口的联络关系。

为便利联络在上海设立无线电台一座,经费预算每月965元。

6. 汉口组:1938年10月16日派出组长谷兆芬、副组长郑达善在汉口组建。派员在武汉三镇、平汉粤汉两条铁路沿线及长江

航线各轮上布点。工作地区为武汉三镇、平汉粤汉铁路线及长江上中下游。其任务是：(1) 侦察日军在华中的兵力布置及其军事进攻计划。(2) 侦察敌在武汉部署的空军实力。(3) 调查敌在武汉存储的军火数量。(4) 侦察敌在两江及平汉、粤汉路的水陆军运输状况。(5) 监视敌在华中地区的政治阴谋。

为便利联络在武汉设立无线电台一座，经费预算每月 1920 元。

7. 香港组：1938 年 11 月 3 日派出组长廖淑伦、副组长郑庭荣在香港组建。工作地区与人员分布为香港、澳门、广九铁路沿线。其任务是：(1) 侦察敌在华南地区的军运情况。(2) 侦察华南敌海陆空三军实力及其布署情况。(3) 调查日军在华南的军事行动计划。(4) 侦探在香港的国际间谍活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5) 调查日本由欧美各国输入的军火数量。(6) 了解英国的对日态度动向。(7) 建立本所与平、津、沪、汉、青、济、爪哇各站点之联络线。

为便利联络在港设立无线电台一座，经费预算每月 1550 元。

8. 爪哇组：1938 年 10 月 20 日派出组长饶楚白赴爪哇活动，工作范围面向南洋、日本。其任务是：(1) 调查日本在南洋的商业势力。(2) 侦探日军对南洋的侵略计划。(3) 了解日本在南洋的发展政策。(4) 在日本内地建立情报网。

本组所得情报送往香港，由无线电台发回，经费预算每月 175 美元。

在 1938 年内，虽然组织成立为时尚短，但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地组织不断向汉口发来所获取的敌方情报，并向中苏双方政治军事机关与最高当局提供了不少经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 039(军事)《本会特种情报——民国 27 年度工作报告》。

过分析研究和判断的情报成果,为开展对日政治军事与外交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辅助。据报告,到该年底,该所共获取敌伪情报 148 件,经筛选后呈报上级的有 91 件,其中来自苏方提供的有 27 件,占 18.3%;来源于上海组的 20 件,占 13.5%;天津组的 21 件,占 14.2%;汉口组的 18 件,占 12.2%;香港组的 10 件,占 6.7%;宁夏组的 52 件,占 35.1%。

从上述统计情况来看,宁夏组的工作成绩比较突出,其中主要的收获是有关日本及伪蒙方面的政治、军事动态变化情报,这对我国军队在绥远一带北方战场的抗日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价值。直接来自苏方的情报也占有较大的比率,主要内容是苏方侦探到的有关日本政军界动态和战略部署情报。对中方了解世界大势及敌方状况,判断敌军在华战略变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这一点上来看,中方在中苏情报合作中受益非浅。又如来自天津站和上海站的有关日军兵力、人员抵港转运方向的情报,则对正面战场上我军应对日军的作战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国对日抗战的初期阶段,战争局势瞬息万变,知己知彼的情报需求十分迫切与重要,尽管由于具体的资料欠缺,我们无法更全面地了解上述各地网站所获每份情报的内容及其价值,但可以推测的是,在当时中国官方的中统、军统特务机构刚刚由对内型向对外型发展而尚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形下,这些由“对外合作”而得来的情报,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将会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另外,据已有的档案文件显示,中苏“技术研究所”内的有关部门在研究密写、照相和编制密码及破译工作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少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 039(军事)《本会特种情报——民国 27 年度工作报告》。

同上出处。

成果。从这些成绩来看,该所在建立与加强中苏情报合作,密切双边关系,引进苏方的间谍技术,加快中国情报工作的发展以及推进抗战事业方面,都是有着显著收获的。

三

1938年底,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上,中国军队仍在顽强地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形势比较前期抗战时的丧师失地,已进入了相对的稳定阶段。而此时英美西方列强对日军侵华,仍采短视而不计后果的“中立”态度。1939年4月间发生的“日英天津事件”,充分说明了英美的对日立场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这次事件中,英国为对日妥协,竟不顾中英关系,违背正义和良知,将在天津英租界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国人捕交日方,并撤退了在天津的英驻军,表现出了及其软弱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继续联合苏联抗日,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因而得以继续延续与深入发展。

在上一年度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基础上,1938年底,中苏“技术研究所”又拟定了该所的《1939年度工作计划》。这份计划十分详尽而具体,从中我们可对该年度内中苏情报合作的发展方向、活动内容及预期结果知其大要。

1939年中,该所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发展与加强各地原有组织。其具体内容是:

1. 扩充情报员队伍。其工作地域分工如下:

(1)天津组负责东北各市;(2)北平组负责张家口、承德、石家

同上出处。

黄美真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庄；(3)山东组负责烟台、徐州等地；(4)上海组负责杭州、南京、芜湖，并新设立南京组；(5)汉口组负责九江、岳阳、信阳；(6)香港组负责广州、澳门等地；(7)宁夏组负责五原、百灵庙、绥远；(8)爪哇组负责日本、台湾。

2. 增派前往敌占区各地的流动情报员。

3. 发展对敌反间工作，按照“有孔即入，无微不钻”的原则，计划深入日军内部发展组织。

4. 充实后方与敌占区之间及各地小组间的交通力量。

5. 加强内部组织管理运作的领导工作。

6. 改善所内行政机构，提高办事效率。

(二)增设各地情报网站。

1. 该年度内在南京、广州、徐州、郑州、西安、太原、沈阳、哈尔滨、宜昌、长沙、南昌、日本、朝鲜、台湾、马公岛增设分组。

2. 在各战区普遍设立群众性情报网，其工作区域划分及分工是：

第一区负责四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东莞；

第二区负责三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上海；

第三区负责五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汉口；

第四区负责一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郑州；

第五区负责二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太原；

第六区负责山东全省及苏北地区，组长在济南；

第七区负责河北及察哈尔省地区，组长在北平；

第八区负责九战区全部地区，组长在九江。

根据上一年度的工作情况，中苏“技术研究所”准备利用这一情报网，进一步扩充其工作范围与工作领域，主要是将情报搜集工作向细致化方向发展，要求其内容更加充实、完全，以便能更直接地为抗日军事斗争服务。除对日工作外，“技术研究所”也更加重

视对日本在沦陷区各地扶植的伪政权及其主要汉奸人物的侦探与策反工作,并注意到反间手段的运用,这说明研究所的工作从内容到水平都要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按照工作计划,1939年中苏“技术研究所”各地已有及新设站点,将以搜集侦探如下几方面的情报为其主要工作目标:

1. 敌军部队的调动转移,其各部队的组成、作战任务与目的;
2. 敌军屯兵部署与数目、各部队主官姓名、武器装备之数目种类,敌兵情绪之变化;
3. 外来敌军开入战区内各部队的运输方法、日期、地点、成份、组成与数量;
4. 各交通要点敌军部署情况、军需武器存量,尤其对敌方各要害地点以及守备兵力较少地点者更要注明。
5. 各地敌兵工厂、化工厂生产品种数量及工厂员工人数、厂区警卫情况、产品运往何处等情报,以供我方采取破坏手段之用;
6. 敌方军械库、粮库等设施地点情况,以及有何可资采取行动之机会条件;
7. 各地敌军兵器种类、驻地、数目、警卫等情况;
8. 各地敌空军驻地飞机场之数目、地点及其警卫情况;
9. 有关日军化学兵部队的情报;
10. 各地伪组织成份、主要及知名参加人员的住址状况,以及可以利用的与日本人关系、与日伪特工组织关系等等;
11. 尚未加入伪政府的已投敌汉奸人员状况;
12. 敌伪特工状况,其组织、人员、驻地、长官及相互间联络方法等等;
13. 注重反间问题的利用,探听敌对我方的政治军事阴谋;
14. 刺探日军对南昌、长沙的再攻计划及对我部署在沦陷区内的游击队的肃清计划,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工作;

15. 设法混入敌方间谍与反间谍组织,开展工作;

16. 争取与策反伪政府官员。

(三)扩充本所通讯联络网。其具体任务是:

1. 完成 15 个分台的建设,总台增加两部发报机;2. 增加通讯联络工作人员;3. 改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指导;4. 加强检查各地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四)继续开展特工技术之研究,内容为:

1. 研究改进密写方法和药水书写方法;
2. 在照相方面,研究革新与提高行动人员和固定文件的照相技术;
3. 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熟悉仿制技术,尤其是有关钥匙、护照、图章、敌伪通行证的制作等等;
4. 进一步进行密码技术的研究创新工作,用以翻译敌方密码和创编自用新密码。

这份工作计划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本所自成立以来,因战事变化关系,一再迁移,对外交通费时,工作一时未能按预计开展,各外勤单位虽无良好的成绩,但经(民国)二十七年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今后当不断推进。”

四

进入 1939 年后,日本的南进趋势愈加明显。2 月间,日军占领中国海南岛,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9 月 1

台北“国史馆”藏档:039(军事)《1939 年的工作计划》。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海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7 页。

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打响,英美各国已知战争在所难免,在日本明确无误的南进攻势面前,不得不转变立场,真正开始疏远日本,积极加强战备,同时出于与苏联同样的目的,伸手援华,与中国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合作。此后,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随着中美、中英关系的逐步加强,受中国外交大局的左右和苏联国内加强西防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需要而产生了变化,其政治重要性、战略地位都开始下降。但据资料显示,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在后来的3年内仍在一定程度与规模上得以延续,并仍在发挥着有效的作用。

1941年7月11日,当时兼管中苏“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说:

“奉谕全力侦收东京与罗马通讯等因,自遵办。惟日意双方无线电声音微弱,侦收至为困难,又兼每日空袭时间停止工作,遗漏甚多,除加紧努力,并在技术方面改进外,谨将本月1日至10日侦译情形汇呈之。

一、1日至10日共破获68份。

二、其中已攻破者计8份,以后如有重要情报当由职亲自送呈也。

谨呈委员长钧鉴。职毛庆祥呈。附呈情报8份,统计表13张。”

同日又呈报7月2日长春站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一份,内容是:据满方之情报,二日驻长春苏联领事问满方称:居住长春

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039(军事)《技术研究室呈蒋介石文》第3号,1941年7月11日。

之馆员及其他汉从员等约七、八十,因须回国,拟请发给出国护照等语,此一行预定于二日自从出发之一行偕返(此处原文如此,疑有误)。

8月1日,呈报截获日本两份情报:一为7月13日北平日本占领军当局发出致南京、烟台、济南、青岛各地驻军及东京电,通报“帝国与苏联之关系,极为机微,随军势之发展如何,有殆致重大场面之虞(当地方面军亦作同样之规测),华北及蒙疆方面各部应注意对侨民之保护,以期万全之策……”

二为东京日本外务省向驻美国、加拿大及南美各重要都市使领馆发出战争准备的命令:

“鉴于目下国际情势之紧迫,贵馆保管之文书,应照左列办法处理。1. 普通文件应于平时最短时间内处理之,其他文件应特别将其搜集保管。2. 为平时之整理兼顾非常之应变起见,应参酌日常之工作任务情形办理。文件中如有贵重者,即寄回本省,其他转手不需者,逐渐焚毁之。3. 焚毁之际,应由负责保管文书者监督执行,注意其绝对不得泄漏机密。(焚毁文件之目录,寄还本省)4. 如因避难而实行移动文件时,应始终严密监视,不得稍疏虞。”

很明显,这两封被破译的日方电文是极重要的,特别是第二封电文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这证明“技术研究室”的破译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

同上出处,《技外又 0011号》1941年7月11日。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039(军事),《技二甲(三)号译文》1941年7月13日、《技二甲(二)号译文》1941年7月10日。

苏为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结成同盟,世界两大阵营完全形成。英美被迫对日开战,与中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情报合作,而苏联则倾全力对付德国,随着日本北上犯苏威胁的减缓,中苏“技术研究所”的历史使命至此也就趋于结束。

1942年1月28日,毛庆祥向蒋介石呈报:调查统计局人员陈祖舜等79人已脱离技术研究所,奉调回局工作,少将副主任魏大铭、第四组少将组长方砚农等所内现任干部亦申请免职。蒋介石批复同意,但指示所有机器设备暂时继续留在研究所。然而,这个记载了一段中苏共同抗日历史的“技术研究所”何时才告最后结束,因史料阙如,便不知其详了。

总的来看,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是中国此期寻求外联开展全面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苏两国关系史上隐蔽而重要的一方面。在抗战开始阶段,其规模与作用比较突出,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其作用与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有力地推进了中苏的抗日合作,密切了双边关系;

(二)初步建立了对日情报搜集网,促进了中方在对日情报作战领域内的力量增长与技术手段的改良进步,开启了中国对外抗日情报合作的先河;

(三)在政治军事上均具有实际的重要辅助作用,有效地保障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政治军事情报供给,并在客观上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决心。

但另一方面,我们纵观中苏“技术研究所”在中国抗战时期对外合作史上的地位与其历史作用,比较后来中英、中美在此领域内的合作关系及其成绩,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台北“国史馆”藏档:特种情报 039(军事)《毛庆祥呈蒋介石文》,(1942年1月28日)。

首先是双方的此种合作历史为时较短,其次是其成果仅仅局限于情报搜集与处理,并无更多的训练、对敌破坏与骚扰攻击等行为,合作内容并不全面,更不深入,无法与后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相比。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苏间的这种合作,受双边政治关系影响极大。由于政治立场及意识形态不同的影响,中苏两国此时已不可能恢复过去北伐时期那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虽然在大敌当前情况下,双方能够不计前嫌地再度联合,但在双方的心底,依然是旧隙未合,彼此之间都有提防,都更加注重根据各自的现实需要,在合作中获取眼前的实际利益。另外,苏联方面除与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合作外,他们还在中国上海、北平、哈尔滨等地另建有许多独立的情报网点,与中国共产党也有情报合作往来。对于这一点,国民政府当局十分清楚且非常反感。因此,当英美受日本威胁准备与中国联合之后,蒋介石及其政府很快就决定转向英美,在军事及情报各方面选择对英美全面合作,而逐步冷淡了苏联。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德国攻苏和日本南下,苏联集中国力抗击德国入侵,防日抗日的的需求减缓,于是,中苏双方的情报合作关系到此也就只能转向下坡了。

由于原始档案资料的缺少,我们目前似无从了解更多的有关中苏“技术研究所”的详细活动情况,但无论如何,抗战初期的中苏情报合作,作为一段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应当为后人所了解。

(作者马振犊,1961年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